

新作点评

一场点史成诗的舞蹈想象

徐馨春



历史与艺术是一对奇妙的关系。历史是事实的记录,有记录就有缺失,历史越久远缺失越严重。艺术是想象,是基于事实的虚构。历史与艺术相互取长补短,历史给艺术想象可靠的事实,艺术可以填补历史的疏失和缺漏。

2月11日至13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共同制作,北京歌剧舞剧院、新疆新玉歌舞团演出的历史题材舞剧《五星出东方》(许锐编剧,王舸导演)在国家大剧院圆满完成了全国巡演北京站演出。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两千多年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的历史信息极其稀缺。由于它跨越千年的历史预言和巧合高度契合中华民族的时代图景和美好期待,是文艺创作的珍贵题材,也由于它的历史信息极其稀缺,给文艺创作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个题材首先被舞蹈这一艺术样式“捕获”是幸运的。

舞蹈是最原始、最本真、最普泛的人类艺术形式。《毛诗序》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俄国芭蕾大师米哈伊尔·福金看来,舞蹈要表达人类内心世界找到最完美的形式。可见,舞蹈是表达人类思想情感最有力量、最合适的艺术样式。用最有力量的艺术样式来表现历史信息缺失的文艺题材,是非常合适和必要的。该剧高水平地编排创演出一场融通古今的舞蹈想象,钩沉文物深邃的历史积淀,释放出其中丰厚的文化蕴藉,揭示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真理,表达出当代各族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心声,开创了文物题材舞剧的新形式,是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彰显时代崭新气象的优秀舞剧。

笔者认为,这部舞剧首先成功在对文物IP的艺术解读和释放。该剧以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为核心IP,生发出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之间,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这个故事设定符合生活逻辑,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结构性矛盾的语境下,奉、建特、春君的个人关系从情感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价值认同,最后到命运认同,但个体的命运难以超越时代的宿命,因而奉最后被北兵所杀,这是历史的结果。由于这个悲剧结局深化了作品主旨,提纯了精神境界,增强了戏剧张力,这也是戏剧的需要。舞蹈艺术是形象强于叙事,舞剧《五星出东方》通过用舞蹈塑造形象的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天真烂漫、取汉名向往东方的精绝首领之女春君,忠诚勇敢、尽心守护西域安宁的汉戍边将领奉,彪悍耿直、最终心归大汉的北人首领之子建特,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观众在欣赏多彩多姿的舞段和精良考究的服化道灯光舞美设计的同时,记住了人物,记住了故事,记住了这块汉代国宝级文物,进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旨被观众所接受也是润物无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其次,该剧成功在以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想象历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该剧以汉代文物为构想之源,通过讲述一段虚构的故事,很好地还原了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当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邂逅这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时,也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舞剧中的人物和故事,仿佛故事是真实的。这当然与主创团队高超的艺术手段有关。比如,考古队员在尼雅遗址现场考古发掘的首尾呼应给观众造成极强的代入感;再比如这部作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还原了一千多年前西域即古代新疆的历史人文风貌。从精绝古国的国名,到参考克孜尔石窟中“龟兹壁画”里“伎乐天”的灯舞,再到剧中服装从颜色、样式、纹样等设计都结合了出土文物中的元素,以及提取自织锦护臂色彩的灯光设计等,都充分汲取了历史素材;还比如故事的构造符合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最后,该剧的成功还表现在舞蹈艺术本体的创新发展上。舞剧中的舞蹈往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式,一类是叙事式。而该剧中的舞蹈不光是为渲染情绪或营造气氛,更不是单纯地为舞而舞,而是恰到好处地递进了情节,这样的舞蹈是为讲述故事、塑造人物而服务的,让观众不觉得费解,才是有灵魂的舞蹈,才能打动人心。威武雄壮的将士持钺舞、婀娜灵动的精绝女子捧灯舞、刚劲有力的修筑城墙舞、诙谐幽默的洗澡舞、活泼俏俏的春君独舞、情意绵绵的二人舞,富有禅意的僧人三人舞,都有效地推进了故事情节,既让观众觉得好看易懂,又使舞剧的结构更为紧凑。特别是奉向众人“讲述”长安景象一段,随着春君的讲述,端庄雍容的仕女舞、插入汉乐府《长歌行》吟诵的丰收舞、面具舞等轮番上演,尽显大汉都城的风华和气象,与西域舞蹈形成鲜明的风格对比,既丰富了舞段的视觉呈现,又烘托了奉的英雄人物形象,还使一心向往东方的春君人物形象变得真实可感。这些舞蹈已经形成了核心舞段,具有标示性的舞蹈动作设计,具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和民族特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是对当代中国舞剧艺术的特别贡献。

(作者系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音乐诗剧《青山风骨》在京演出



《青山风骨》剧照 杨天昊摄

由冯必烈编剧、郭凯敏导演,中国煤矿文工团与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音乐诗剧《青山风骨》日前在北京二七剧场首演。该剧取材自“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杨善洲同志的先进事迹,以叙事诗的方式将原创音乐、朗诵艺术与戏剧表演相结合,用诗化的语言表现了杨善洲60年如一日对党忠诚、艰苦奋斗,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22年造林兴林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杨善洲是党员干部的楷模,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云岭大地涌现的全国重大先进典型之一。1988年退休后,杨善洲主动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逐步建成了占地面积约5.6万亩的大亮山林场,并于2009年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超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自2020年9月起,中国煤矿文工团相继赴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以及杨善洲林场、杨善洲故居、清平洞、杨善洲干部学院、隆阳区板桥镇北汉庄等多处杨善洲生前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寻访老书记的足迹,进一步坚定了以音乐诗剧的形式来塑造老书记朴实无华的形象、弘扬其崇高精神的创作理念。

作为该剧2021年重点创作项目,该剧由刘中军、李汶娟、庄志强任总策划,贾雨岚任艺术总监,汪江任道具设计,李杰任作曲。郭凯敏、徐涛、何音、张兆北、白薇、阿木古朗、何恺鹏、王欢等共同演出。据悉,首演完成该剧还将赴保定市及云南各地市进行巡演。(晓璐)

《狙击手》:所有千钧一发,皆指向黎明

李亚祺

由张艺谋执导的《狙击手》虽寻求新的切入点,借用“狙击战”这样一个影史上有大量珠玉在前的影片类型进行创新探索,却并未创造票房奇迹。在笔者看来,其原因既包括排斥率低等因素,也说明特定类型电影与主题相结合的商业化过程具有一定挑战。但该片的高口碑却说明,对电影叙事艺术的新探索、对人物形象和情感更深入的挖掘、对民族精神更有艺术性的刻画,始终为人们所期待。如果进一步分析其高口碑的原因,很大程度正在于该题材电影以其有新意的叙事手法和叙事形式为传统电影叙事注入了能量,激活其叙事张力和叙事层次,令人在一次次紧张的“千钧一发”中,读懂属于中国人的朴实情感,充满义气的热血以及关于黎明的信心与希望。

首先,狙击战与心理战指向了扎实、激烈的故事内容。就叙事手法而言,“狙击类”电影往往围绕一个集中的任务,在双方的对峙中,呈现主人公智慧与勇气的双重超越。而在敌我军备实力悬殊的状态下,如何讲述一个让人心生力量的故事,《狙击手》以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展现出人物的心理能量与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大师手笔。正如以二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经典狙击类电影《兵临城下》,苏军青年狙击手瓦西里与德国“王牌”狙击手之间的较量既是不同阵营的对抗,也是个体意志与心智的比拼,而较量之外,人性情感的丰富、任务本身的复杂语境都令人感喟与震动。张艺谋的《狙击手》同样设置了明确的任务:带不知生死、躺在战壕中的侦察兵亮亮“回家”。事实上,朝鲜战场上的“冷枪冷炮运动”,其背后是中美军备实力的悬殊,我军需要以“狙击手”的士兵智慧,有效歼灭对方的主导势力。此时,狙击手的瞄准镜是一个“中介”,高度考验个体的智慧、临场判断的应变能力,而非仅仅是勇气。

从这一点上,张艺谋不仅注意到一个主题,并进一步将其细化到一次作战任务,通过敌我双方在稳定场景中不断改变的作战策略、每次交锋前因后果的清晰解释,在曲折波澜中有效呈现出了个体的能动力量。例如对班长的刻画,铺垫悬念的同时突出其在紧张战况中,于无声处听雷、于未知处判断形势的心理能量,其战术上的“见火再敲、后发制人”等,相较单一突出战争悲壮的情节,更具有叙事的吸引力,对中国力量的展现也有了更具底气的表达。

其二,叙事形式加持情感的呈现。不同于许多经典狙击类电影所塑造的“孤胆英雄”,张艺谋的《狙击手》依托的是对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个性与集体精神共时性的刻画,且同时反衬出美军狙击手自我精英化的显著特点。这也意味着,如何平衡个体的丰富情感与集体信仰是一个挑战。导演以对情感细节的动人刻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不是无勇无惧的,生死的瞬间变化必然会让人彷徨和不知所措。正如面对队友一个个离去,大永始终是“爱哭鬼”,因



《功勋》:群众史观下的英雄书写

赵靖宜 张慧瑜

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是中国主题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的重要方式。英雄劳模片能够赋予个人品质和行动以道德规范的力量,同时具有整合社会共识、形塑国家认同的功能。从根据地时期以来,通过评选英雄模范来动员群众、凝聚人民力量参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雄模范电影也成为了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中的重要类型。这类电影通常会真实描摹现实中典型人物的个人选择与生活,刻画其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品质,将典型人物“浪漫化”。因此,如何让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是决定这类作品能否真正起到感化、鼓舞人民作用的关键所在。

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展播剧目,《功勋》可以看作为英雄模范片类型模式一次守正创新式的尝试。该剧以“共和国勋章”的八位获得者的个人故事勾连出百余年来中国人不懈奋斗、改天换地的宏伟史诗,充分展示了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历程。一方面,该剧将个人视角与国家故事结合起来,将士兵、党员、科研人员、农民等社会生活各领域“普通人”的行动镶嵌入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中,诠释了英雄模范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该剧超越个人的苦情叙事,呈现先锋个人与群众之间互助与共生的关系,弥合了英雄书写与群众史观的联系,彰显出中国特色的英雄主义精神。

一、逆向流动的个体:个人叙事嵌合国家发展

自根据地时期以来,深入边区、扎根基层以投身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建设历程的“逆向流动”的主体就是英雄模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代表着一个由被压迫走向独立与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基于现实发展需求而形成的主体状态。这种“逆向流动”不仅是从发达城市回到不发达农村,也包括放弃留在发达国家的机会而回归祖国、建设祖国。《功勋》选取的几位先锋人物都属此类,他们的选择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建立“功勋”的国家英雄。

剧中,科学家在整体的叙事篇幅中占比最大,反映出20世纪50至70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大众的密切关系。于敏、黄旭华和孙家栋三位基础科学与军工领域科学家的故事集中呈现了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突破重重技术封锁,独立自主地研发出氢弹、核潜艇、卫星以保障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的根本安全。屠呦呦和袁隆平这两位医学和农业领域科学家的故事则表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如何感知到百姓面对的切身问题,并因此扎根基层开展研究,反哺百姓,真正“为人民服务”。

故事中暗含的科学家与国家、民众的关系,彰显出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此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而叙事的个人视角则进一步增强了人物塑造的可信度、共情力和故事的感染力。科学家们选择“逆向流动”的原因、每一个勾连起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决定以及随后的漫漫成功路被还原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之中,如于敏和研究院负责人老郝看完戏在街边就着一碗馄饨决定了隐姓埋名投身核物理事业;黄旭华在一个普通的上班日早上被临时通知去开会,一次秘密的会议和29个科学家的沉默,奠定了我国核潜艇事业的起步;袁隆平在对母亲的感怀之中展现出自己对百姓的一片赤诚之心……由此,一个个有特点、有个性、有温度的“典型模范人物”跃然而出,还原了于平凡中见伟大的“功勋之路”。

如果说科学家的故事呈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建设视角,李延年、张富清和申纪兰的故事则自下而上地反映出发展视角——个人在政治身份与认同上和国家的同构关系。《能文能武李延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讲述指导员李延年如何团结战友,并带领他们成功守住346.6高地的故事。一方面,李延年在动员中诉诸人之常情,将革命逻辑还原为民间逻辑,家与国、个人与集体不再是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士兵个人视角下对战友情感的刻画和对酷烈战争的亲身呈现,也使得观众和剧中人一样对国家产生身份上的认同感。

党员张富清和人大代表申纪兰的故事则以个人命运勾连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建设。张富清出于一种对已故战友的歉疚感延伸出对人民的责任感,在战争后深藏功名,扎根贫苦的来凤县,成就了扎根基层、造福人民的叙事。与此相似,申纪兰从一个不得不承担起养家重担的新娘子,逐渐成长为带领同村妇女纺织布匹、下地劳动并积极分家,在劳动和斗争中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并由此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而李队长、县政府以及《人民日报》记者作为党与国家的“代表”为她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与支持,引导她成长为一个具有政治主体性的“新妇女”。这一叙事不仅巧妙地缝合了申纪兰的个人时间与实行工分制、新法接生的推广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时间,更特别的是,借由农民这一以往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在新生国家中“正向流动”的故事,补充、丰富了《功勋》整体上呈现个人与国家共生关系的视角。



二、个人与集体的统一:群众史观下的英雄书写
个人视角叙事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对日常生活与人情关系的呈现。在这一侧面,该剧呈现了各具特色、各有立场的人的或冲突或合作,不仅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社会心理以突显先锋人物的选择和行动的“英雄”之处,也由此彰显了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群众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几位科学家的故事中。该剧将科学家开展研究的过程还原为其日常生活中试验与失败的循环、同事和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互相关照或偶尔不合、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等,不仅凸显了个人特点,也将先锋个人所代表的成就指认为所有研究人员集体劳动的成果。尤其在于敏的故事里,通过展现他亲临车间指导工人们制造、组装氢弹,国家级的高精尖成果真正被呈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协调各行各业、人民通力合作的结晶。

通过全景式的呈现,该剧的又一亮点是认指了作为劳动主体的女性。这不仅体现在女性从事的具体工种上,更体现在对女性一直以来就是劳动主体的这一事实的呈现。剧中,女性在家庭这一往往被英雄话语忽略的场域中现身。在指导员李延年动员展示的过程中,女性为家付出的种种贡献被公开表达、承认,女性不仅在丈夫的缺席中承担起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切活计,更以温情弥合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无名英雄于敏》中一次部委组织的面向研究人员家属的春节联欢会上,于敏妻子王芹的一句“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可以视为剧作借之向这一时期默默付出、牺牲以支撑家庭和国家的无数女性的致敬。在某种意义上,这与申纪兰的故事形成互文,女性所从事的劳动经由个人和组织的努力被命名、被认可,“妇女解放”也得以从一个“话题”落地为妇女们“走出家庭”“顶门立户”,在劳动中重获人际交往、家庭地位和自我价值的喜悦。

该剧播出后好评一片,除了选角更为贴近新一代观众的喜好、剧作更富吸引力和感染力外,更重要的是,该剧通过深入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丰富表现维度,以个人见国家,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承载着中国人红色记忆的历史,也为无数观看的个体提供了一种统合国家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建设性的主体想象。

(赵靖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